

# 西高地:探索散文的多维可能

## ——阿来《西高地行记》研讨会发言摘要

《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

《西高地行记》可从四个角度进行评价,阿来式“行走”的独特意义应高度认可。

一是创作方法论的驱动力角度:阿来的作品《西高地行记》主要围绕藏地的自然风物、历史现实,构建了独有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里最大的内在驱动力是“发现”,是求真,从求自然之真到求历史真相和文化真义,求索的姿态在所有文本中都清晰浮现。

二是体裁与题材的对比角度:阿来小说备受关注,与他的非虚构作品相比并不逊色。不论是 he 费时甚巨的《瞻对》还是这部行走笔记。前者通过对历史的钩沉发微,集中重现一段康巴人的传奇,更偏重学理;后者通过在藏区多地行走的记录,发散式讲述了这些相互关联地区极为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书写的是即将成为历史的变与不变的现实。二者共同印证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阅读与行走可谓阿来公开示人的创作秘笈,也是他笔力不衰的强力支撑。

三是“行走”的意义角度:《西高地行记》中记录的“行走”是主动、自觉的行走。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行走多有遭贬、征战途中的见闻和感恩,也有李白、徐霞客的遍访山水。阿来的行走笔记中虽时有性情流露,但大体都存在目的自觉。在自我构建的认知和价值框架中,去观察、发现、求证。他不但在新鲜的环境中去发现,还时常在熟悉的环境和事物中重新发现。精确、自由、丰富难能地共存于文本,成为阿来式的标识。

四是作品的形式、语言文字本体角度:文中的语言错落有致、简洁凝练,体现了汉语的传统之美。文字中经常有画面欲跃出纸面,白话长短句富有音乐节律,随便读起一个段落即可成诵,是真正的美文。

四川大学教授、《阿来研究》主编陈思广:

就《西高地行记》而言,作品宣传、推介工作值得反思和讨论。

一是封面腰封文字中阿来对“西藏”的定义与阿来的原本表述有差异。阿来在《西藏是个形容词》的表述是“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地的时,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而非概念化的西藏。那么,我要记述的也该是一个明白的西藏,而非一个形容词词化了神秘的西藏。”而《西高地行记》的腰封文字为:“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地的时,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

二是封底引用的谢有顺先生的评介与其原本表述有差异。

三是推介语与著作内容本身的联系性和准确度还值得我们讨论。我在网络多个平台,仔细对比、观察了读者的反响和评论,并保存了网络截图,也可以作为例证。腰封文字对作品本体评论产生的重要影响不容小觑,对于我们研究《西高地行记》,应当是一个切入点、切入点。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李长中:

如何呈现作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的真实面向,成了阿来写作的价值论,行走则是他的方法论。在阿来看来,通过漫长深入的行走,触摸广袤的高原大地,表述那里的历史与现实、文明与衰歌、败落与新生。这样一来,阿来就成了一位向导,带领他的读者去看看那个被他称为西高地的魔幻又现实、传统又现代、神圣又世俗的高原,那些与我们有着同样情感、同样生活、同样需要的高原上的民众。

《西高地行记》是“行走”的必然结果,从阿来的“行走”进入,可将阿来的“行走”定义为一种还原高原真实性的文化苦旅。阿来的行走背负着更多的负荷。一方面,因区域空间上的偏远和族群意义上的少数,西部高原地带往往成为他者出于各自所需而任意阐释的漂浮能指,或者在资本逻辑下成为时尚化的空洞符号,结果“只是看到差异,甚至为了差异而至于虚构。”另一方面,当一种主体缺乏自我表述或表述权力被迫让渡时,这种主体就会成为被他者随意阐释的形容词。并强调他的行走就不是那

种“礼失求诸野”式的浪漫化漫游,也非古典意义上对物化或商品化的批判。他的创作过程可概括为:经年累月的行走、观察、记录,事无巨细的审视、检省、追索,跨学科知识的涉猎、博取、研判。这种“行走”中,他的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在不断抵达中敞开,成就了他的文学史意义。从这种文学史意义视角切入,阿来的“西高地”行走不仅是一种将高地纳入中国的仪式,更是“让这个世界的人彼此看见”。

可以这样总结:阿来明显不是那种瞬间爆发并持续高产的作家,他也五次三番地强调他的作品不多。因为,他对写作有一种执念:即将写作看作是漫长的旅程,或者说,他要写他之所“看见”,即使已经写出来的作品,他也要按照作品中的空间构置重新行走一次,甚至数次。经年累月的行走、观察、记录,事无巨细的审视、检省、追索,跨学科知识的涉猎、博取、研判,占用了阿来过多的时间,也成就了他的文学史意义。他的每部作品问世,皆引起强烈反响,即是“徐徐展示其大”的明证。

四川大学教授唐小林:

阿来在《西高地行记》中扮演了行者、思者、诗者和写者的角色,行走在自然、人文和审美的广阔地带,求索于文化与文明的来路和去路之间,以物的厚描与思的高远,标识了当今游记散文的新高度。

在阿来个人写作意义的角度,《西高地行记》是阿来在小说之外的一次更为酣畅淋漓的表达,赎回此前被虚构叙事所限定不得不留下的某些话语空间。阿来笔下的西高地也就不只是生气贯注的自然景观,更是人类复杂人性的镜像。在此一镜像中,阿来师法自然,横跨中西,穿越历史与现实的那些忧伤、悲悯、同情、感动和觉悟,构成了对人类自身的一次内省与反思性的新发现、新认识。

还应当明确的是,西高地文学地理空间与自然地理空间相互照亮,在光芒的交汇处,在与自然的相互映照与发现中,重新塑造了“西高地”的人文地理形态,并在无形中“东沿海”形成对照,改塑了这个时代文学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这或许是阿来《西高地行记》最具审美价值的地方。

《西高地行记》是生态散文,但又超越了生态散文,阿来走向、抵达、观想和构筑西高地这一文学行动,远远超出了传统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礼赞自然的文人游记,而是一次思想的远行和苦修,是一次在自然的静观中情感和意志的沉潜和高举,是一次在诗性的持存中达成的对心性的守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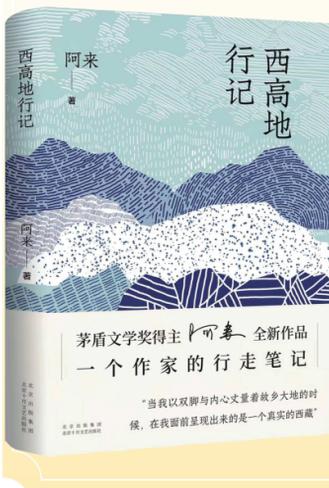
《西高地行记》这一独特审美价值的获取,是基于阿来对这个时代“游记体散文”的两个文学症候的诊断与反击。一个是“意义的空转”,一个是“情感的空洞”。

这部散文的叙事表现出鲜明的综合性特色:它是视觉叙事、听觉叙事、嗅觉叙事、味觉叙事、触觉叙事与物叙事的跨界、贯通与合一,其文字的成色与文本的肌理,既充盈着诗性,更具有肉身般的质感。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谭光辉:

就散文而言,现代散文家各有特色,有的擅说理,有的擅写景,有的长知识,有的擅抒情。阿来的散文集《西高地行记》则综合了各家优点,于徐徐的讲述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具有鲜明的可辨识度。这个辨识度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是题材选择的西部高原地域特色非常鲜明。西高地,指的是川西地区,主要集中在阿来出生地周围广大地区,阿坝故乡、嘉绒、贡嘎山、平武、玉树、果洛、山南、武威、丽江。都是高原,中国西部,文化特征与阿坝地区藏文化类似,因而阿来能够理解其文化内涵特点。游走于汉文化与藏文化之间,能够更深入地讲清楚其文



11月28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和《阿来研究》联合承办的“阿来《西高地行记》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本场研讨会是四川省作家协会2023年度重点精品助推工程系列活动的开场。研讨会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杨献平主持。来自省内外专家们就《西高地行记》各抒己见,对其思想内涵、创作手法和写作历程等展开了细致的研讨。

化深意。

二是藏汉融合的身份定位准确而独特。阿来从不讳言自己汉藏混血的出身身份,作为有藏族血统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身份特征突出。第二个身份是作为一个文学大省的作协主席身份。阿来从不把这个身份作为自己骄傲的资本,而是客观冷静地仔细观察和思考自己所看到的现象,以一个优秀作家的身份本色出镜。

三是富有思想。思想是对事物和概念的判断性连接。阿来的散文是有思想的散文,处处流露出作者对所见物、事的独立判断。思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阿来的古今中西文化知识、文学知识极为丰富,逸闻掌故信手拈来,恰当妥贴;二是常有崭新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他的“元散文”式的写作方式,在散文中是比较难于见到的。

四是有真性情。情感是对叙事的判断。阿来在散文中对每件观察到的事,都有鲜明的情感表达。真性情,则是指情感具有本色特征,不是服从于某种体制的情感表达。阿来在文中的情感流露,表达了一个不服从于他人情感的真实情感表达。

至少可以判定,《西高地行记》具有鲜明的风格标记,没有廉价的抒情,没有主观的演绎,探索了散文写作的新路子。

绵阳师范学院教授冯源:

我们可以将阿来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进行对比:阿来在小说创作中以纵向的时间中轴,以不凡的虚构艺术手段,筑造出一部富有波澜壮阔气势、思想意蕴深厚的雄浑史诗,史诗融合了藏民族的情感史、心灵史、宗教史、文化史、民族史与文明史;散文创作则以横向的空间为序列,真实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建构了藏民族业已经历的社会历史变迁,或正在领受与其它民族之间深层交往、友善相与、走向融合的大趋势,以及充盈着现代文明风尚和气韵的社会图景。

我得出以上结论的依据:从审美观照的地理空间看,《西高地行记》所写地区皆分别处于第一级阶梯、第二级阶梯之内,堪称为地理意义的高地。从这部散文集篇章顺序的安排来看,作家审美观照的路径:先南后北,再北而南,三度的来回往返,给文学读者以这样一种深刻影响:作家仿佛是在进行精神穿越,从而架设起一座人生行走、情感放达、内心从容、灵魂自若的桥梁,或者说构建了一种蕴含特殊审美意义的文学地理空间。

从审美描述的具体对象看,一是对自然物象的细腻描述。二是对历史意象的描述,既有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也有对历史细节的描述,还有对各种书籍所记载历史的描述;三是对某些文化场域或社会现状的描述。

从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因看,一是因为作家有着一半的藏族血统或生命情缘的确定身份或事实,对于那片巍峨雄奇的土地富于无可逆转、天然与共的钟爱;二是因为在作家的内心深处,这一区域是自己生命最初降临与最终回归的所在;三是因为那片高地已然成为作家生命、生活、生存及

情怀、理想的诗意栖居地。从散文的艺术呈表上看,以叙事为主,同时又兼容了抒情、描写、说明、议论等方法;在散文语言的运用方面,依然采取富于诗化特质的语体表达方式。这部散文集既具有民族史的思想意蕴,又富于散文史的审美丰繁。

四川大学教授高树博:

《西高地行记》是打捞沉默的历史与跨越界限的言说。

一是对阿来革新实践的认可,就这部作品来看,阿来因在小说形式上革新而被称为“文体家”,他对散文本体问题的思考及在散文形式上所做的实践同样值得重视。

二是对于阿来散文研究的体会,如果将《西高地行记》与阿来的散文著作《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结合起来阅读,将既有助于对《西高地》的理解,更利于从散文文体角度把握阿来的创作历程及推进对其散文的深入研究。

三是作品被视为长篇散文的原因。《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西高地行记》之所以可以被视为长篇散文,就在于它们各自的内部不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一个统一体。当然,这并不是说三者之间是相互封闭的。

四是阿来的散文具有自觉的互文意识,在《西高地行记》的写作中,他毫不避讳地重提了其青年时期出版的某些作品,如《故乡春天记》提到诗作《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嘉绒记》提到散文《马》等;《玉树记》提到散文《远望玉树》。

五是阿来散文的“游”与“散”。阿来散文的模糊性成就了其自由性,阿来在大地游走,他的足迹固定在散文中。旅行、游览。游是阿来的文学生命形态、实践形态,散文是对这种状态的言说,两者真正相得益彰。游与散是同构的。

六是阿来的散文的多维特点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植物的祛魅、史料的客观性与散文的艺术性。在《西高地行记》中,阿来一方面给读者呈现旅游的动态过程,通过叙述的转换,引导读者与他一同游览,另一方面他又在叙述、抒情和议论中堆砌了大量史料——引用而非自己考证的成果。批判精神。学者的知识储备与作家的才情的平衡和融合。

四川大学博士袁佳慧:

从博物学的视角切入,可以解读《西高地行记》如何实现了文学与博物学的跨学科融合,以及阿来与约瑟夫·洛克这些西方博物学者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首先,博物志是解读阿来创作的一大重要视角,这种博物学知识体例产生与进化的过程都和游记密不可分,我们能从《西高地行记》这本游记中发现丰富的博物学元素;另一方面,它所描写的西部地区,也在20世纪吸引过众多西方博物学者,留下一系列外来的理论和成果。

分类与命名是博物学的基础。比如《贡嘎记》中记录了作家的涉身实

践,与“山水”环保组织的专业人士,一起区分了越橘和白珠之间的差异。博物学正是反对解释学,通过“移除”各种符号意义“揭示”自然物体。阿来提倡,游记体散文应当学习植物学上细微准确的观察,可以说一语中的。这一部分就只简单举一例。《故乡春天记》和《嘉绒记》中植物授粉的片段,展现了科学知识 with 文学想象的跨学科交融。作家对雌蕊形态与授粉过程的描写十分精确,同时运用了赋予观察对象以能动性的修辞。

轶事也是博物志文体的一大构成要素,利用动植物个体对描述进行补充。比如从命名产生联系的康定木兰,在轶事中变得更加亲近和立体。以上便是文学与博物学的融合,而在此基础上,作家从本土的立场对博物学进行反思,同西方学者进行了跨文化的对话。

约瑟夫·洛克是作家在博物学上的启蒙人,曾多次深入中国西部。洛克将纳西人奉于文化之上,同时又贬于文化之下,这样的分类只体现了他将其拒斥在文化之外;相比之下,阿来的态度则是心怀谦逊和感恩,沉潜于自己的族群与文化之中。

总之,《西高地行记》的博物之旅之中,阿来以准确的分类知识进行高原植物学的涉身实践,用文学性的描述呈现西部大地的自然之美,追寻着博物学家洛克等人留在家乡的旧踪迹,同时讲述出独属于本土文化的新故事。

四川大学博士朱意:

我们可以从听觉、视觉、形式等多重角度赏析这部作品。

一是视觉建构角度:“西高地”在阿来的创作视野里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方位和叙述焦点。清人王士口也在出使蜀地的路上留下纪录。《西高地行记》《蜀道驿程记》中有着共同的视线焦点:雪山。相似的是,两部著作在这个共同的关注点上,都呈现出“诗画”的性质,在景物描写中加入精雕细刻的画工手法。

二是听觉叙事角度:《西高地行记》的文学叙事中,阿来借助音乐来探索新的表现路径。音乐本身和音乐的结构元素既是他表达主题的出口,同时也是情感体悟的入口。阿来把音乐的构成要素或品格内化为文字的技法,造成各种艺术效果,形成纪游的旋律和节奏。阿来用交响乐的思维,打破视觉与听觉间的隔阂,在音乐的场域中,用重复、对比、和声、再现等乐思,和奏鸣曲、回旋曲等结构,实现文学的表达。

三是行走之思角度:《蜀道驿程记》中,作者将行走的感悟蕴藏于景物的书写中,寓情于景,化感受为无形。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看,《蜀道驿程记》这类清代游记代表着古代游记的沉浸式图景:人在景中,思在场内,以“我”观物。阿来对同类景物书写的处理方式上运用了“间离”的境界——这是一种以戏剧手法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尝试,注重文学的理性启示超越情感体验,强调观赏主体应该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的“场外性”和“观察者”的身份,保持自觉的判断力和思辨力。这种思维境界,使阿来的写作既具有诗性的浪漫,也不乏现实主义的关照。《西高地行记》中,阿来有一个“自我”,一个“超我”,两种视角并置。既有“自我”的沉浸式感动,更多的是“间离”境界的思考,以“高地”的视域,俯瞰这片土地的所有生命,从“自我”上升到“超我”。

总之,《西高地行记》中多重的叙事图景和交响乐的和声结构,使他的文体有着诗歌的吟咏、音乐的回旋、对位与共鸣,戏剧的“间离”境界,传达着一种厚重又灵动的力量。阿来不仅将古代文学传统作为精神养料来继承,更是在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中,开拓出新的创作范式,是我们探索传统和现代游记文学的桥梁。

作家蒋蓝:

阿来写作的地域特点:阿来的写

作没有离开“大横断”地理空间。1900年左右,京师大学堂的地理学家邹代钧在其讲义中第一次提出了“横断”这个词,我们现在加了一个“大”,概括那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阿来的写作都没有离开“大横断”这个地理空间。他的文学世界基本都是在这个地理空间里穿行、思考,而且对文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特别强化。

阿来的创作方法论:中国传统的“风物学”与西方“博物学”的有机结合,成就了阿来写作这片土地的方法论,尤其是非虚构的写作。1860年以来许多西方学者用“博物学”的视角开始书写那方土地,已经160多年了。但是,我们中国有一种视角,即“风物学”的写作,这种写作就是对风物的考证,这种“风物学”与西方“博物学”的有机结合,成就了阿来写作这片土地的方法论,尤其是非虚构的写作。或者说,大视野的博物学,更多运用西方博物学的精细、理性眼光,又具备中国风物写作的这种方式,这便是阿来的整个非虚构写作里面重要的结合方法。

是不是跨学科、跨文体,应当是区分非虚构与散文的重要标准。用“文学散文”或者“纯散文”区别超出地缘视野的写作,是“小化”“矮化”文学的表现。时代在发展,我们的写作不能囿于“纯”。有些刊物编辑就下了一个定义加以描述,叫“文学散文”或者“纯散文”,以区别于很多领域好像超出文学家的地缘视野的那种写作,比如说对植物学,动物学极其详细的博物学写作,甚至很多文学编辑不接受这样的文章,认为此类不属于纯文学。我觉得,这是文学编辑基于自己知识的贫乏和眼界的逼仄所造成的。

阿来散文写作的理论意义:阿来用双化的方式成为一个书写整体性的、民族的诗学者,弥补了西方100多年来对藏地的纯生物学描述,突破了西方博物学家的视野。

阿来的这种书写目前没有其他作家能做得更好。阿来和西高地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对望。相互赠与,相互保管,也相互加持”。阿来一生都在山河与民众之间,慢慢走向大地的深处,真正兑现大地写作的承诺。

阿来在总结发言中说,我去往河西走廊、敦煌、丽江等等,它们都是古往今来不同民族不断迁徙、不断交融,发生很多故事的地方。我眼中的西高地,是个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地方,我的目标不光是“走”,眼光也不局限于“走”,要有民族、自然、人文、历史、现实的结合。

当下,我们如何恢复散文的活力,恢复散文对现实的强大叙述能力,值得努力,我也愿意做一些尝试。目前写作之中,其中也有一个难一点的,就是跨界,越来越狭窄的散文的定义和理解,实质上可以阻碍散文的发展。散文的范畴应该逐步打开、扩大,这种观念是有传统的,回想《古文观止》,里面收入的散文很多都不是纯文学,还有不少应用文。

当下的文学,多是聚焦人与人的关系,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的丰富,却比较少触及。就算是触及,也不是专门关照自然本身,而是将自然作为一种意象的投射物,它不再是自然物,变成了一种寄予我们情感的事物。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词:象征。荷花是什么?从《爱莲说》开始就有这样的意象,它变成一种象征事物,梅花、兰花等也有其意义。当赋予植物象征意义的时候,其自然意义就慢慢萎缩了,作家只书写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的意象,这值得我们思考。

《西高地行记》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散文,也并非概念化的非虚构写作,作品在博物学、生物学、风物学、文化学等角度突破了纯文学的范畴,对散文文体作了更多可能、多元维度的探索;《西高地行记》在语言本体、形式结构、思想意境上有很高的质量,几乎可以媲美阿来的小说作品;从《西高地行记》出发,四川作家在阿来主席的领导下,将“行走”于探索散文多维可能的路上。(晨霖)